

第三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文集

ZHONGGUO MINZU
LÜYOU YANJIU(2012JUAN)
中国民族旅游研究

(2012卷)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
桂林理工大学民族旅游研究中心

吴忠军 龚锐 主编
杨主泉 副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第三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文集

ZHONGGUO MINZU
LÜYOU YANJIU(2012JUAN)
中国民族旅游研究

(2012卷)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
桂林理工大学民族旅游研究中心

吴忠军 龚锐 主编
杨主泉 副主编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珍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旅游研究. 2012 卷 / 吴忠军, 龚锐主编

—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637 - 2694 - 3

I. ①中… II. ①吴… ②龚… III. ①少数民族—民

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5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58 号

中国民族旅游研究(2012 卷)

吴忠军 龚 锐 主编

杨主泉 副主编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x@ 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7. 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中国民族旅游研究 2012》编写委员会

顾问

周明甫(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主任委员

黄忠彩(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巡视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

副主任委员

吴忠军(桂林理工大学民族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程道品(梧州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邸平伟(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书记、教授)

龚 锐(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院长、教授)

金海龙(琼州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明庆忠(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孙丽坤(大连民族学院旅游系主任、教授)

唐晓云(中国旅游研究院副教授)

王 凯(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主任、副教授)

王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朱普选(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前 言

民族旅游作为促进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发展势头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影响日益显著。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旅游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条件及其旅游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使民族旅游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且不断深入,呈现出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中关于发展民族旅游产业的相关指示与精神,提高中国民族旅游研究水平,加强学界之间、学界与政府之间的成果交流;形成中国民族旅游发展共识,总结一批全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和经验,以民族旅游研究理论指导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实践,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由此,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成立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整合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就民族旅游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交流,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在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中国民族旅游论坛,定期回顾、总结和展望国内的民族旅游业与民族旅游研究,这将大大提升本领域的研究水平,指导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实践,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民族地区在新形势下遇到的新情况,民族旅游应当发挥积极和有效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民族旅游研究工作者要以更加负责的研究态度、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更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认真研究解决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努力把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建设成为民族旅游研究交流的平台、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旅游管理决策的“智库”,为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作出贡献!

为充分反映论坛取得的学术成果,共享资源,在征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同意后,将在每次论坛结束后选择部分论文续集出版,因篇幅有限,还有一些较好的论文未能收入,我们深表歉意。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书中文字尚显粗疏,可能存在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主任 吴忠军

目 录

交流·共识·合作

- 第三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纪要 冯雅力 1
-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的意义.....
..... 陈志永 李乐京 李天翼 4
-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民增收机制研究
——以程阳侗寨为例..... 吴忠军 潘福之 冯雅力 20
- 旅游业与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李忠斌 万享明 33
- 乡村旅游发展成功模式比较及对广西的启示..... 刘宏盈 44
- 新千年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业经济效应探析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罗盛锋 黄燕玲 55
- 乡村旅游视角下的农民增收研究
——以龙脊平安壮寨为例..... 吴忠军 吴少峰 65
- 对发展民族乡村旅游的个案调研与思考..... 邸平伟 79
-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农牧民增收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林越英 张丽娜 85
- 南岭瑶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研究..... 邓 敏 项 萌 92
- 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生效应实证研究
——以甘、青、宁、新为例 窦开龙 97
- 海南少数民族旅游低碳开发思考 黄丽华 110
- 试论主题饭店对民族地区旅游的影响 景 曦 117
- 民族旅游开发与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以云南省个旧市为例 李天雪 胡珊珊 122



浅谈黎族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林日举	128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发展与策略调和		
——基于协同的视角	刘安全	136
民族文化旅游综合体实践模式的理论思考	陆军	144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居民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以龙脊梯田平安壮寨为例	潘福之	155
回族聚居区农家乐旅游开发中的女性参与者角色转换研究		
——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沙爱霞 马义红 陈忠祥	160
深生态视野下的民族生态旅游		
——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为例	石坚	167
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民族古村落旅游规划设计	韦 达	176
旅游者对民族文化旅游真实性的意识与实践	吴晓山	185
旅游背景下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的实证研究		
——以程阳八寨为例	吴忠军 陈东芝	197
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维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薛玉梅	208
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几点思考		
——以广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例	张瑞梅	215
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广西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陈红玲	220
基于色调的特色旅游产品及线路开发研究		
——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	段文军	226
西江苗寨旅游景观解构及其旅游价值评价	李 盼	232
桂林《印象·刘三姐》项目之创意与效益研究	李少游 陈 欢	242
我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以桂林古东瀑布景区为例	梁福兴 李广宏	249
傈僳族文化旅游产业建设思考		
——以云南省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为例	鲁建彪 余文兵	258
民族技艺:旅游化传承与资本化运营		
——以云南新华村银器加工技艺传承与发展为例	吕本勋	273



民族文化村社区旅游整合发展建设的探讨

——以镇山村为例 岑 怡 283

乡土知识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

——以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 杨 艺 291

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价值增值研究.....

..... 孙丽坤 张振国 盖玉妍 298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绩效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朱普选 李海燕 305

“TG 聚合模式”

——西部民族区域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选择 张文磊 315

浅论民族旅游 21 世纪的发展选择..... 周作明 320

基于贵州旅游大省战略下大旅游教育格局的构建 范莉娜 325

浅析多民族地区旅游英语教学改革 张 洁 332

文化应为旅游本科学科建设的第一视野 龚 锐 338

交流·共识·合作

——第三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纪要

冯雅力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 桂林 541004)

2012年6月8~10日,第三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由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凯里学院、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协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明甫,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司级)、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国家旅游局副司长邓宗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忠军,贵州省旅游局副局长李三旗,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高万能、校长王凤友出席了论坛的开幕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就旅游扶贫议题作了重要讲话。

本次论坛以“民族旅游和文化产业”为主题,主要采取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旅游开发需要重视国家和政府力量、避免功利性、同质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今后民族旅游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凯里学院旅游学院罗永常院长对巴拉河民族旅游开发的郎德、南花、西江千户三种模式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民族旅游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优势,为今后民族旅游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范式。北方民族大学王凯教授、西藏民族学院朱普选教授分别就民族旅游的地空问题、民族旅游资源与其经济效益的空间差异问题作了深入而精彩的主题发言,论坛气氛活跃,专家代表发言后,对其他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答辩后另有专家点评。整个论坛体现了一种自由、平等、民主、活跃的学术交流气氛。本次论坛共有来自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国家民委、国家旅游局、贵州省旅游局、贵州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等30多家单位,共81位专家学者,来自14个省份。论坛共收到论文45篇,涵盖民族旅游与民族团结、民族旅游与文化遗产、民族旅游的转型升级、民族旅游与人才培养等议题。在主题讨论中,各个专家和学者就民族旅游概念、民族旅游发展模式、民族旅游相关利益者、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旅游规划、民族旅游

【作者简介】冯雅力(1983—),男,河北衡水人,汉族,桂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

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旅游学科建设、族别文化旅游开发、关注特困民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议题可以归纳为民族旅游的理论与方法探索、民族旅游与文化产业、民族旅游与学科建设三大类。

一、民族旅游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陈志永、李乐京、李天翼通过对朗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组织的演进过程和制度建构的分析研究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途径,旅游精英对社区增权起到了有效的助推作用。桂林理工大学的邓敏和项萌通过对南岭瑶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发现:适时开发休闲观光型、务农参与型、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能帮助当地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邵向奎和江军对海南省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并对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探讨,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桂林理工大学吴忠军教授针对现有区域旅游竞争力研究的不足之处,运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重新构建民族地区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为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他还以广西程阳八寨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民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吴忠军教授通过分析认为:民间信仰与歌舞表演、聚落建筑与耕作工具等五个因素深入影响了村寨整体景观的变迁,且外在因素对景观变迁的影响大于内在因素。陆军以民族文化旅游综合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典型个案的考察总结了民族文化旅游综合体的形成历程,诠释了其基本内涵,并深度解析了民族文化旅游综合体的实践路径。韦达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对广西柳城县古砦仫佬族滩头围村进行了导向型的规划设计,借以探索新的古村落旅游规划设计导向模式。贵州民族大学薛玉梅认为,在旅游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社区参与的践行力度明显不足,西江的“家庭博物馆”以福利性质的形式吸引社区参与,得到了当地农民的认同,使得古民族村寨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回归和谐。总体来看,众多专家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对民族旅游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多数专家认为,开展乡村旅游和民俗旅游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社区参与制度和机制尚存在许多不足,须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

二、民族旅游与文化产业

桂林理工大学李少游对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的分析认为,对传统文化内涵的发掘和创意可以形成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不仅促进了旅游的发展,也传承了民族文化,拓展了经济、社会的效益,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和思考可以为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岑怡以镇山村为研究对象,对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文化选择、旅游承载度、管理力度和社区居民参与利益分配等诸多现实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关于构建镇山村社区旅游整合体系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只有重点解决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沟通体制,才能使社区旅



游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的鲁建彪和于文兵以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为个案,对傈僳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进行傈僳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建设,一方面,要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傈僳族文化旅游产品;另一方面,要树立对傈僳族文化产品进行生态保护的思想,遵守适度开发的原则。广西大学陈红玲基于新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广西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进行研究,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完善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性建议。总体来讲,专家认为挖掘旅游资源文化的内涵、提升文化品位是乡村旅游和民族风情旅游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旅游与学科建设

贵州民族大学的范莉娜提出在贵州旅游大省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构建大旅游教育格局的思想,她提出:应当通过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提高全民旅游意识、整合旅游教育合力、对旅游院校改革和创新的途径、增强贵州经济发展中的软实力,为贵州旅游强省战略提供智力保障。张洁以对民族地区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旅游英语教学为研究对象,认为应该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模式、师资建设等方面实施改革,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实用型人才。贵州民族大学的龚锐针对现今教育中存在的学科独立性差、本科教育课程安排上普遍存在的重竞技、轻文化、重理论、轻实际操作的现象,从文化的视野出发,将文化融入旅游,回归旅游本源,提出文化应为旅游本科学科建设的第一视野的议题。

总结这次论坛,我们可以认为,第三届民族旅游论坛具有四个亮点:一是参与人数多,涉及的省市、自治区较多,尤其是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有专家参加,体现了民族旅游发展的趋势;二是企业参与,在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焦殿成董事长论述的校企合作的模式、经验等,也是本论坛的亮点之一,为今后校企合作提供了经验;三是中青年专家、学者踊跃参与,所提的观点也较新,这是今后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希望与中坚力量。这些都将对民族旅游理论的探索、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相关学科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 制度建构及其增权的意义

陈志永¹ 李乐京¹ 李天翼²

(1. 贵州师范学院区域旅游研究所 贵阳 550018;

2.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的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关键词】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增权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趋势显现,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以其活态的民族文化及淳朴、洁净的乡野田园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纷纷兴起旅游开发的热潮;并以此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我们对贵阳市花溪镇山布依村寨^①、黔东南黎平县肇兴侗寨^②、黔东南雷山县西江苗寨^③、贵州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④等地的长

【作者简介】 陈志永,男,云南曲靖人,1976年2月生,管理学硕士、教授。李乐京(1967-),男,贵州贵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营销、区域旅游发展。李天翼,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

① 陈志永,梁玉华.民族村寨旅游地衰落研究:以贵州镇山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7(1);梁玉华,陈志永.少数民族村寨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实证研究——以贵州镇山村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6(6).

② 吴昌良,陈志永.影响民族村寨旅游业持续发展因素综合分析——以黎平肇兴侗寨为例.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3).

③ 陈志永.社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西江苗寨旅游开发模式演变的调查分析与评价.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5);陈志永,杨桂华.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热带地理,2011(2).

④ 陈志永,李乐京.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及完善建议——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文化村为个案研究.旅游学刊,2007(7);陈志永,吴亚平.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阶段性演化与产权困境分析——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热带地理,2012(2).



期跟踪调研与深入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村寨内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层次与旅游利益的分配不平衡,社区获益面不大;部分村寨社区居民非但不能获益,还要承受旅游发展所导致的物资与服务短缺、物价上涨等负经济外部性效应;一些村寨因政府、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导致社区居民被边缘化,无法介入旅游管理和决策层面。相关文献及媒体报道显示,上述现象绝非个案,云南、广西、四川等地也存在此类问题。如此下去,社区居民将失去资源保护和进一步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从而致使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直接威胁。民族村镇旅游地如何突破上述困境,探寻适合的模式与路径,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苗寨自1987年启动旅游开发以来,村民始终为社区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旅游开发管理与决策、旅游经营与接待,以及社区文化资源、环境保护的主体,发展中始终将“所有人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应该家家受益”的核心原则延续至今。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1]。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了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我们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在中国目前的社区旅游发展中,像郎德这样的少数民族贫困村寨,如何依靠社区力量实现增权?增权的模式和路径是什么?有何典型性和借鉴价值?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将通过对郎德苗寨社区组织的演变和制度构建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诠释社区增权的路径及社区增权模式的参照意义。

二、文献回顾

“增权”一词是从“Empowerment”翻译过来的,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其基本价值在于协助弱势群体及其成员,透过行动,去增强调适的潜力及促进环境和结构的改变;透过社会政策和计划,去营造一个正义的社会,为民众提供平等接近资源的能力和机会^[2]。有关增权理论的研究根植于西方国家社会的工作传统,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维护观点、市民权利和妇女运动,以及草根组织运动的孕育而形成的一种实务工作取向。80年代以后,对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活跃。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扩展运用至旅游研究领域。阿卡马尔(Akamal)于1996年^[3]最早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必要性,雷金纳·谢维斯(Regina Scheyvens)^[4]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索菲尔德(sofield)^[5]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2008年以来,国内学者保继刚、孙九霞、左冰(2008;2009;2012)^[6-10]等率先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在对增权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吸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旅游增权的基本路径,并以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为例,探索将旅游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旅游实践的框架、途径和模式。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孙九霞等为代表的学者为旅游增权理论植入中国,推动旅游增权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受此影

响,陈志永等(2010;2011)^[11-12]分别以贵州郎德苗寨、西江苗寨为例,对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郭文(2010;2011)^[13-14]在对云南香格里拉雨崩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意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增权的效能展开横向比较分析。黄娅(2010)^[15]通过探讨社区层面上个人、组织和社区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对少数民族传统民艺开发中的社区增权进行了实践架构探讨。上述成果为旅游增权研究的后续展开提供了重要铺垫。然而,深入研究发现,已有成果并未从组织和制度视角出发对旅游影响下社区增权的路径与模式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实为遗憾,同时也为本文提供了足够的研究空间。组织和制度作为人类的两项重要发明,人类依靠这两项发明运行并延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活动。组织与制度的关系,也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制度主义兴起之后,制度分析的方法已跨出经济学范畴,被广泛应用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之中^[16]。有鉴于此,笔者将从组织和制度理论视角出发,借鉴雷金纳·谢维斯^[4]构建的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维度在内的旅游增权框架模式,通过分析贵州郎德苗寨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组织的演进与制度构建过程,诠释社区增权的路径和模式。

三、案例地的典型性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地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郎德苗寨^①,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北部,西距省会贵阳 260 公里,北距州府凯里 27 公里,南距雷山县城 13 公里。全寨共 134 户 540 人,全系苗族。该村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全寨赢得了数项荣誉和桂冠,强烈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光、考察,是贵州省“巴拉河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区”重点建设的民族旅游村寨之一。2006 年被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世界级乡村旅游村寨,其乡村旅游示范项目被世界旅游组织作为成功案例向世界各国推广。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分配制度和运行模式,吸引着众多学者的长期关注。以郎德苗寨为样本地,对旅游地社区增权展开实证研究,显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如下:(1)从理论层面讲,作为源自西方社会的增权理论,从最初在社会工作、社会学等少数研究领域的运用,至今已扩展应用到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充分证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渗透力和运用价值。但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旅游发展阶段、土地所有制等方面差距明显^[17],需要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及不同旅游地特征对旅游增权理论加以“解释、补充、修改”,才能有效探究我国社区居民增权的有效路径和模式,推动旅游增权研究的本土化、应用性发展。(2)从实践价值看,探寻典型样本地社区增权的模式和路径,可为相似背景的旅游地社区增权路径的选择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① 郎德苗寨包含郎德上寨和郎德下寨,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专指郎德上寨。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研究者在自然前景下采用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8]。资料收集方法采用深度访谈,辅之以实地观察和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21世纪初以来,郎德苗寨逐渐成为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焦点,有关郎德苗寨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呈逐年上升之势。研究者于2008年7月首次到郎德苗寨调研,与县旅游局负责人、郎德苗寨村党支部书记、部分接待户及村民进行了交流,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有了初步认识。2009年2月,笔者重返郎德苗寨,对其乡村旅游启动、运行模式及存在问题展开调查,在此基础上,对贵州天龙屯堡和郎德苗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展开横向比较研究^①,并对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困境展开深入分析^②。2010年8月,研究者再次带领学生深入郎德苗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对郎德苗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的感知状况展开研究^③。2010年9~12月,研究者多次与长期关注郎德苗寨旅游发展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初步拟定该课题,确定大体框架。选题初步确定后,研究者又先后3次到郎德苗寨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农户28家,雷山县旅游局、文化局、发改委、郎德镇主管旅游的镇长及村委会负责人共15人次,围绕该课题内容对关键人物及部分村民进行深入访谈,以期回答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历次访谈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及前期已完成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旅游影响下郎德苗寨社区组织的演进与重构

资料显示,苗族虽然历尽艰险、辗转迁徙,形成不同的支系,但仍然保持着苗族的共同特征,这得益于其民族内部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苗区,都有寨老、鼓社、议榔等这些维持社会运转的职位和组织,在相当长时期内共同维系着苗族社会的正常运转^[19]。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构建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在此过程中,苗族社会的内生秩序受到冲击和改变,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受到严重削弱。当全国普遍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之后,由乡政府指导下的村委会成为法定村民自治组织。然而,村委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作为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延伸组织,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使村和组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在宏观的单一体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20]。由此,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异化为“要钱、要粮、要命(计

① 陈志永,周杰. 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天龙模式和郎德模式的比较. 贵州农业科学, 2009(6).

② 陈志永,况志国. 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学术探索, 2009(3).

③ 陈志永,李乐京.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研究. 商业研究, 2010(9).



划生育)”,难以落实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职能。农民虽因人民公社解体和生产单位划分到小私有单位的家庭而焕发了家庭的内在积极性,但却导致广大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事务无法解决。“有房有地不靠你,有吃有喝不求你,不批不斗不怕你,有了问题就找你,处理不好就骂你”,成为当时农民思想状态和处理问题方式的生动写照^[21]。这样,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异化及农民生产劳动的“原子化”状态使广大少数民族贫困农村社区组织化程度下降到最低,乡村公共产品无法正常供给,传统文化出现了低迷、失落乃至走向衰落的危机。这是当时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组织结构真实写照。但在乡村、民族(俗)文化旅游兴起的局面下,部分资源富集、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村镇因卷入旅游开发,从而实现了社区组织的再造与自我整合。郎德苗寨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之一。

1982年,贵州省文化厅发出《关于调查民族村寨的通知》,经过调查与比较,郎德上寨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村寨景观引起省文化厅的高度关注,于1986年将该村寨列为民族村寨重点保护对象并予以保护性资助。对当地村民而言,政府征用重构的仪式活动意味着本民族的乡土性传统受到官方层的关注,获得了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认可和肯定,本群体的民族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可由此得到某种意义上的确证与提升^[22]。这样,受到鼓舞的村民在省文化厅资助和寨内精英——老支书陈正涛的带领下,开始整治寨容寨貌,兴修“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铜鼓坪。整治后优美的村寨环境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为烘托热情好客的氛围迎接来访客人,村委会组织村民穿上苗族盛装,设置十二道拦路酒仪式和举行芦笙、歌舞展演。因参与接待客人而造成的务工损失,来访者往往会给予村民一定的现金作为补偿。由于当时村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不够,参与人数并不多,加之旅游发展初期外来客人较少,村民所获补偿不多,并未能从旅游发展中尝到甜头,参与的主动性不强,常常需要村委会多次动员,村民才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参与旅游接待。21世纪以来,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参与集体接待与歌舞表演尝到甜头的村民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生产、生活由过去完全以农业生产为主逐渐转移到旅游接待中来。部分村民尝试从事家庭接待,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部分村民出售本地出产的农特产品及富有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在接待游客并同游客的交流与互动中,村民逐渐认识到旅游业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他们逐步从内心深处接受并渴望发展旅游业。在参与集体接待与经营的同时,村民们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为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他们还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及管理制度的构建与修订。这样,郎德苗寨村民从最初个别的、被动参与转向全社区的主动介入。与此同时,村委会成员逐渐从基层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与职能中抽身出来组织村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之后又成立旅游接待办公室,组建旅游接待小组^①。接待小组由20名左右村民组

① 郎德苗寨村委会与旅游接待小组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文中并没有对二者作严格区分。担任村党支书、村主任、会计等职务的村民不仅是村委会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旅游接待办公室的核心成员,这就使村委会和办公室在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及组织村民参与旅游接待与经营的工作中能协调一致。



成,由村民推举产生,实行轮流制。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主要工作有:与旅行社或被接待方接洽,确定演出价格和时问;用广播通知和组织群众;接待时酒具、案几、芦笙等用具的准备;工分牌发放和回收;工分登记、计算和分红;淡季组织表演队排练;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维护村寨环境、卫生及市场秩序。最终,郎德苗寨在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旅游接待小组的有效组织下,社区参与的内容由最初的集体接待逐渐演化至经营、决策、培训、生产、环保等完备的参与体系。

郎德苗寨村民在各级政府引导、支持和以陈正涛为代表的社区精英的组织、动员下,逐渐从分散、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状态卷入有组织的集体接待与经营中,并在村庄层面形成了代表整个社区共同利益的自治组织——旅游接待小组(村委会的主体)。其角色与功能逐渐由外在的强制性组织机构的延伸演变为组织村民参与旅游接待的公共组织,在旅游发展中发挥着村寨凝聚和自我组织运行的功能。旅游影响下郎德苗寨村民的集体行动以及村民自治组织角色与功能的转化,推动了社区的有效参与,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重新构建了乡村社区组织体制,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和价值。

五、制度建构:郎德苗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诱致性制度的构建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经济类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应该体现“文化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文化经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统一,促进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3]。然而,由于村寨旅游资源的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完整性、系统性和不可分性是作为旅游资源的内在条件;客观上使旅游资源产权无法完整地界定给农户,导致资源处于公共产权状态,“公地悲剧”难免出现。不仅如此,经历了百年革命运动的洗礼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的农村社会逐渐解体,正向半熟人社会迈进,村庄道德舆论约束能力和村庄社会性收益越来越显得不重要,村民的行动越来越精于计算经济利益,越来越少依赖于舆论的评价^[24]。旅游发展中一旦有人搭集体的“便车”,便会有一群人随之跟上,导致社区内生秩序难以维系,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证集体行动的理性和农民增收的持续性,防止“公地悲剧”的出现和“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如何通过制度建构使社区共有的人文及自然资源成为能为每个村民都带来利益的资本,使人人都在旅游开发中获利,就成为郎德苗寨必须解决的问题。

1. 利益分配制度的构建

集体接待表演是郎德苗寨最主要的旅游项目,本寨村民均有机会参与表演并获取收益。旅游接待小组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旅游接待,制造、烘托村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和热情好客的隆重场面,探索出了一套社区参与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工分制”,规定如下:①以工分制计酬,按劳分配。每场旅游接待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实际出工人数,记工分一次,多来多得,少来少得,不来不得,每月结账一次。②参与人员